

诗词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根系,早已熔铸于民族的情感脉络与文化基因。近期有一批新出版的图书,聚焦于中国古代诗词,为读者打开了亲近经典的多维窗口。王蒙的《诗词中国》以诗化笔触串联200余首经典,用阅历与激情解码诗境之美,让千年吟诵化作可触摸的情感共鸣;孙立的《唐宋词的审美特性》深耕微观肌理,从文学审美切入词体本体,在古代词论的术语迷宫里探究创作与美学的深层勾连。前者是流动的诗意图长河,后者是精密的审美解剖,两书殊途同归,均以对诗词的赤诚热爱,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为当代读者提供了重读经典的崭新视角。

——编者

诗,何以成为“中国”?

□陈晋

诗话、词话兴起于北宋以后,是一种较为自由的随笔形式,写作向无定式。《西江诗话》作者裘君弘在自序中概括道,所谓“诗话”,包含“诗品”“诗志”“诗释”“补正”“订谬”“类及”“源流”“异同”“辩证”等内容。这类作品一般面向有诗兴雅意的读者。例如,毛泽东主席便喜欢阅读《全唐诗话》《历代诗话》《分甘余话》《随园诗话》等。

古人的诗话、词话大多注重诗词本身的内证与考据,但也有少数侧重阐发文学和美学主张,如袁枚的《随园诗话》彰显“性灵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则融合西方美学观念阐释诗词评判标准。王蒙的《诗词中国》将这种彰显个人文学、美学主张的文体形式发挥到了某种极致。书中不仅彰显了王蒙独特的人生观、历史观、审美观,更可谓是对古代诗词的“二度创造”。从这个角度而言,《诗词中国》既是一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表见解的文化随笔,也是一本巡礼传统诗词、致敬中国文化、倡导审美人生的优秀文学作品。它超越了传统诗话、词话的内容与风范,突破了传统文人的审美视域,是新时代文人学者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有益尝试。

该书开篇讲上古诗歌《卿云歌》,其中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一句,作者将其译为“日月光辉,一天又一天,光鲜更光鲜”,令人叫绝。我们大多仅想到“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一层,而“光鲜更光鲜”,可谓大雅大俗!(按:王蒙表示,“旦复旦兮”其实也不妨译为他本人的名句“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此又一绝。)王蒙点评道:“从阅读的感染效果看,我愿意设想《卿云歌》为中华礼仪盛典官方诗歌的开山之作!”这篇诗话以“美丽中国的开辟曲”为题,或许正源于此。读此诗话时,我不禁联想到很多诗歌,可见这样的诗话极具启发性,能帮助读者将古典诗词阅读与现当代特征深度融合,获得古今交融的独特体验和充盈的文化满足感。

所谓文化满足感,源自文化主体性。笔者认为,文化主体性即时代感与历史结合生成的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生成的主体性,是新时代文化感悟与传统中华美学精神结合生成的主体性。《诗词中国》恰充分体现了这些“结合”,从而自然彰显出独特而美好的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

该书的词话部分有一篇《李白与毛泽东的〈忆秦娥〉》,颇为精彩,作者将不同时代相似意境的审美意象打通解读。关于李

白的《忆秦娥》,作者从“咸阳古道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几句引申出对历史感的议论:“时间越长,真实的废墟感、西风感、残照感越感人,当历史的距离不是太遥远时,历史是令人心痛遗憾的废墟与残余;当历史已成为古代往昔,距你千年或至少500年时,它反而渐渐成为你的骄傲、遗产、渊薮与品牌,你定会因足够古老繁多的废墟与残余而牛气腾腾。”寥寥数笔,便生动有趣地点出了诗词意象体会和彰显文化自信的问题。关于毛泽东的《忆秦娥·娄山关》,作者精辟地指出,它是“在动态中响起的革命最艰难最低潮时期革命人的沉郁大美心曲角号”。作者认为,该词承继传统意象中的西风、残照、夕阳,却另有一番李白未写出也难以体会的激情与大美,尤其是“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两句,堪称生气贯注、沉郁雄浑。这样的解读,既展现了古代诗词的丰厚超绝,又凸显了近现代诗词中的新情绪、新气象,从而贯穿古今,准确把握中华文韵的传承与发展脉络,呈现出中华诗词宝库生生不息、充满活力的傲人品质。

该书解读的作品,基本是中华诗词史上的名篇;解读的视角,直切文本,重在对诗词的品位与升华;解读的文字,诗意化、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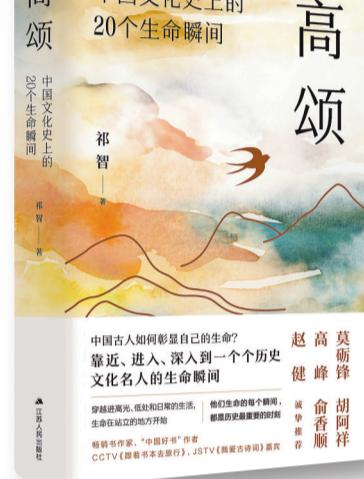


《诗词中国》,王蒙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25年1月

化,属于文学抒写,文句如排浪般涌出,直击读者心灵,这三个特点在书中有机融合,既印证作者的文化见识、审美取向、文学才华浑然一体,又体现出三者互相包容又互相突破、互相呼应又互相激发的关系。

该书是王蒙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上辛勤耕耘的又一重要审美收获,尤其彰显出王蒙深厚的文化素养、敏锐的诗心参悟能力和潇洒的审美气象。这是作家王蒙、读书人王蒙、文化人王蒙,以善于参悟诗心和人心的姿态,通过解读中华传统诗词,表达美学理想,张扬文学精神,抒发对诗词中国的情感寄托。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长)



《高颂:中国文化史上的20个生命瞬间》,祁智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25年4月

“高颂”是一个不直白却蕴含丰富内涵与澎湃力量的词。它并非日常用语,词典中虽能分别查到“高”(意为“在一般标准或平均程度之上”)和“颂”(意为“颂扬”“以颂扬为目的的诗文”等),却无“高颂”一词的完整释义;它也不是典故的直接挪用,在中国诗词中极少作为独立词汇出现,仅明代薛冈在诗句“兴来聊自酌,高颂古人诗”中偶然使用。准确地说,它是一个被精心锻造的意象化符号,蕴含着多层次隐喻与美学留白。

由作家祁智创作的《高颂:中国文化史上的20个生命瞬间》(以下简称《高颂》),精准传递了“高颂”的词中意蕴。该书让中国文化史上20位思想家以破空之姿从历史深处跃出,在世人心中铭刻下永不磨灭的印记。提到此书,许多读者往往会被书中描绘的名人所吸引,他们的生命瞬间与故事交织,汇成了灿烂的中国文化史。祁智以独特的文学手法,勾勒出20位历史文化名人的生命切片:从先秦的哲学思辨,到宋代的文化复兴,这本书超越了传统人物传记的范畴,更像是一幅绚丽的历史长卷。在生活的忙碌中,我们常常忽视历史的深邃,而祁智的文字,正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窥探名人真实与伟大的窗。

历史是不可直接触及的他者,我们对历史的认知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印象与记忆。历史研究以如实反映历史事实为目,但其对象是过去发生的、不可复现的存在,常以记忆、遗迹等历史材料的形式呈现,因而史料与史实之间的张力一直困扰着历史研究。无论怎样尽力收集和运用史料,研究者都需要排列和拼接作为片段存在的史料,而拼接过程中形成的“裂缝”事实上无法弥合。英国历史学家

乔治·柯林武德认为,历史研究不能止步于对历史事实的统计梳理,想象力是复现生动历史的必要思维工具。想象之网能够弥合历史事实间的裂隙,“赋予了历史的叙述或描写以它的连续性”。

在文学领域,发挥想象力更是完成这一任务的重要方式。正如祁智所说:“历史的宏大叙事,都是一个个瞬间的凝固。如果我们能够以自己的方式,靠近、进入、深入到这一个瞬间呢?我们会看到什么?”作者致力于观照国家命运、个人命运、典故与字词,辅以文学想象,从中我们得以看见:被誉为“中华诗祖”的尹吉甫在采编《诗经》,王羲之在兰亭山主持禊禊仪式。此时,《诗经》和《兰亭集序》不再仅是历史文化遗存,而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粒沙——蕴含着这些有血有肉的文化名人完整的微观生活世界。由此,我们得以“走近”历史的本真。

历史上的名人之所以能如闪电般划破黑夜、带来光明,大抵在于他们突破了时间的困境,寻得自己的本真存在。当然,这些本真存在往往不会在当时就彰显非凡意义,而是隐匿于日常生活的真实领域与边缘角落。该书作者敏锐捕捉到一些微弱却惊人心魄的“瞬间”,如老子出关、孟子离宋、庄子祭惠施、屈原沉江等,以生命瞬间为镜像,折射出这些文化名人的生平和志趣。因而,所谓“瞬间”并非物理时间的一瞬,而是生命的高光时刻,正是这一时刻,让这些人从常人中脱颖而出,成为文化史上的坐标式人物。例如,老子出函谷关留下五千言《道德经》,成为流传数千年的道家经典;庄子妻死“鼓盆而歌”,其对生死的豁达态度在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的长卷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生命瞬间构成了历史的关键节点,值得被“高颂”。

时间困境是亘古的人生难题。当现代人日复一日穿梭于钢筋水泥的丛林,被精确到分秒的时间表切割,被无形的社会规则规训,时间不再是生命流淌的韵律,而是异化为一种外在的压迫力量。此时,领略中国文化史上的精彩生命瞬间,当对找回本真存在、克服生命的虚无感具有引领与启迪价值。

(作者系南京大学哲学博士、青年评论家)

——评《高颂·中国文化史上的20个生命瞬间》

瞬间即永恒

词情与词体里的唐宋词审美特性

□阮忠

的本色由“花间词”奠定,旧说“词为艳科”,在缠绵悱恻的男女情恋、离别相思中,人性柔婉的元素通过“媚态”得以体现。尽管这一特质贯穿晚唐和两宋,但孙立认为,宋词具有晚唐五代词所没有的基调。他从乐极生悲、失志落魄和虚无人生三个维度切入分析,提出无论是豪放词人还是婉约词人,词中都未真正实现适意寄托——即便有乐,最终也是乐极生悲;词人失意落魄的背后,是功业未成的茫然与无所着落。而时光流逝中的旧事怀念、人生虚无之感,与前二者共同构成了唐词(尤其是宋词)的感伤基调。孙立强调,如此感伤情调到宋代才形成一个时代的社会习性,并演化为文学创作的艺术精神。

如此说来,宋词的这一基调蕴含着宋代词人的复杂生活与人生情感,它们往往以含蓄蕴藉的表达将读者带入朦胧迷茫的艺术世界。秦观《八六子》中的“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化用了杜牧《赠别》“春风十里扬州路”的典故;王安石《南乡子》中的“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槛外长江空自流”,化用了王勃《滕王阁序》“槛外长江空自流”的诗句。前者“春风十里”似说梦又非说梦,后者“长江空流”似说水又非说水,词人既未道明也无意道明自己对人生的反思。孙立认为,词人叹梦、叹水,终究是叹时、叹老,即便不言感伤,亦是感伤。

在这样的感伤基调下,唐宋词的时空诗化成为一种艺术:诗化的时间变异与空间错落中,时间的春秋,无论煦或肃杀;

空间的天地,无论浩瀚或苍茫,词都以内敛或纵放的方式予以表现。透过这些意象,孙立捕捉到词人的凄怜、深沉、旷达,以及词体的细腻、阴柔、雄浑。感性的词虽蕴含诸多人生哲思,终究以感性为底色,孙立从中梳理出词人思想的轨迹及词体的审美特征。他认为,词体的审美特征包含三个层面:

一是词体的审美感知层。审美感知是词人首要的思维活动,南梁刘勰所言“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即因感知而移情于物,借词得以再现,这是宋代词人的创作通则。孙立提出,此中蕴含“调和之美”,即词人对感知对象进行有序结撰,使其入词后引发读者的再感知;其间少不了词人的修辞,让感知层的审美通过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感官体验,融入文学层面的审美创造,从而实现客观物象的文学重生。他归纳了宋词中风、花、云、水等11种物象,由此形成词的类型化表现范式,这一范式奠定了词的基本创作规范与风格体系。宋词流派的形成,正有赖于认知逻辑与创作实践的深度共鸣。

二是词体的审美情感层。孙立谈及的宋词感伤基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审美情感的定格。在此层面,他关注情感审美化过程及其个性特征。以晚唐五代词人借词传情为参照,他发现柳永词倾心于情感表现,这一艺术性在“专主情致”的秦观笔下达到极致。虽同为情感表现,柳永与秦观却存在差异:柳永情感外化张扬,秦观情

感内敛含蓄,因此在词体上,柳永致力于慢词发展,秦观则多潜心于小令创作。这一差异影响了词的表现形式与风格,使得诗歌自《诗经》《乐府》以来的铺叙、寄托手法重现于词中。而词人审美情感的强弱,也左右着表达形式与手法的选择。

三是词体的审美理性层。孙立认为,词的审美理性是将词人的个体生命与外在现实的相互关系作为审美对象,旨在考察人与社会、生命与存在、自然与宇宙的矛盾统一。这一命题看似玄妙,实则聚焦于词人自我与现实的关联,核心指向生与死的问题。庄子“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辩证观,王羲之以“修短随化,终期于尽”感慨人生无常,皆为世间不可回避的命题。词中涉及生死,即关乎理性层面。孙立认为,不同于感知层与情感层,审美理性层使思维向纵深拓展,与感知、情感共同构成词的立体结构。词的审美理性可称为“词人之思”,它将词导向更深的艺术境界,因其常寄意于言外,形成“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效果。这种理性之思与情感相融,彰显了词的风貌与神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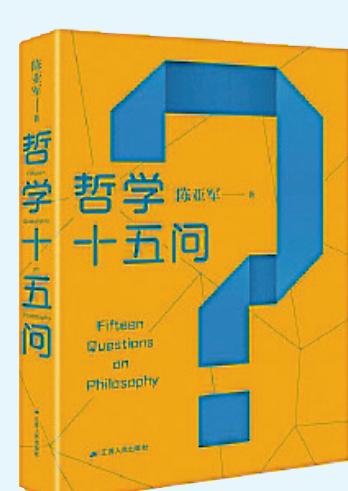
该书聚焦于“词情”与“词体”:从词情中提炼出唐宋词的基调、情爱主题、生命意识、时空艺术;从词体中解析出审美感知、审美情感、审美理性。二者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交织,共同构成唐宋词审美特性的双面维度,引导读者从审美的路径步入唐宋词的艺术世界。

(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书追溯了古代中国“乐”之理论在1500多年间(主要为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11世纪)的演进历程,通过梳理早期中国思想家对道德本原的探讨与人生意义的追寻,回溯孔子、孟子、荀子、庄子、扬雄、陶渊明等先贤对人生的思考,阐释何为美好生活及实现路径。本书系统梳理并阐释了中国早期思想家与“乐”相关的理念,深入探究其内涵、意义与语境,明确区分其与西方古典及近代理论的差异,对跨文化交流与比较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哲学十五问》

陈亚军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5年6月出版



本书脱胎于作者的15场哲学讲座,旨在为对哲学心怀向往却不知从何开始的读者架起一座桥梁。书中聚焦“哲学是什么”“如何使我们的思维清楚”“什么是真实的存在”“实践到底能做什么”“语言为何如此重要”等15个最基本也最叩击心灵的哲学问题。作者并非提供封闭的答案,而是以循循善诱的方式展开探讨,旨在为读者打开广阔的想象与思考空间。

《光影山河:电影与抗战》

秦翼 张丹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5年4月出版



本书系统梳理了抗战时期的中国电影,深入考察14年间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脉络,探讨战争对中国电影产业及电影艺术创作产生的深远影响。书中研究了抗战初期的电影生产、大后方艰苦卓绝的抗战电影宣传、根据地的人民电影创作等内容。通过对战火中中国电影业曲折命运的生动描绘,展现了特殊历史背景下中国电影工作者不屈的精神风貌,以及电影作品在凝聚民族力量、激发爱国热情方面的重大作用。



http://www.jsph.com



江苏人民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